

民

国

五省
联帅

何易 潘荣 著



孙传芳

兰州大学出版社

物

系

大

五省联帅——

孙传芳

何易 潘荣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五省联帅——

孙传芳

何易 潘荣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308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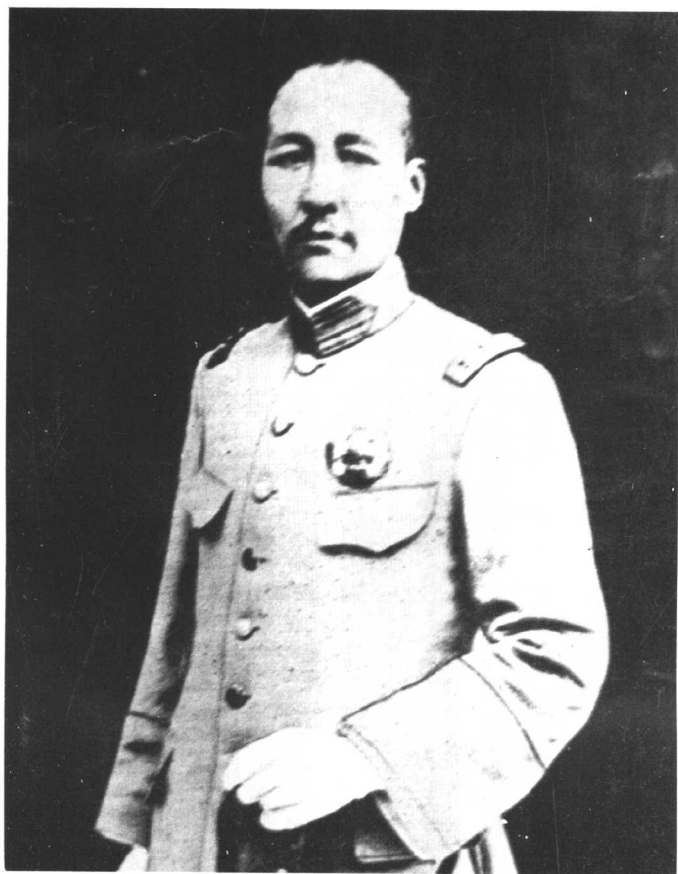
七二二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375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5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7-311-01128-0/K·142 定价:9.50元



目 录

第一章 初投北洋 (1885—1908)	(1)
一、飘零少年	(1)
二、投军逢时 东渡深造	(4)
第二章 王占元的爱将 (1909—1920)	(10)
一、学成归国 重返北洋	(10)
二、追剿白朗 初露头角	(13)
三、王占元的爱将	(15)
第三章 转依吴佩孚 (1921—1923)	(20)
一、扼守羊楼司	(20)
二、弃王投吴	(26)
三、驱徐迎黎充先锋	(30)
第四章 入主福建 (1923—1924)	(38)
一、援川未果 改道援闽	(38)
二、初任闽督 备受牵制	(46)
三、智驱王永泉	(52)
四、让位抚周	(59)
五、助齐伐卢 攫取浙江	(63)
六、广纳降将 实力大张	(70)
第五章 反奉获胜称雄东南 (1925)	(78)
一、“北京政变”后奉军南下	(78)
二、暗中酝酿反奉	(86)
三、太湖“秋操” 突袭沪宁	(89)

第六章 建立东南“独立王国”(1925—1926)	(100)
一、军绅联合政权	(100)
二、招贤纳士 延揽才俊	(104)
三、“修明政治”和“保境安民”	(109)
四、复古和厌新	(112)
五、开发利源 推行“大上海”计划	(117)
第七章 在革命冲击下势焰大跌	(124)
一、坐山观虎斗	(124)
二、国民党人的诱惑 革命思潮的困扰	(133)
三、出兵援赣 精兵受挫	(137)
四、前方御敌 后门“失火”	(146)
五、丢赣失闽 退保江浙	(150)
第八章 托庇奉张 顽固抗拒北伐(1927—1930)	(158)
一、北上乞师 孙张联手“讨赤”	(158)
二、浙军叛孙和浙人“自治”	(165)
三、镇压起义 撤驻江北	(168)
四、拥戴奉张 伺机反攻	(173)
五、龙潭鏖战 一蹶不振	(180)
六、且战且退 转战直鲁	(186)
七、少帅府的高级幕宾(僚)	(199)
第九章 津门寓公(1931—1935)	(206)
一、由苦闷难耐到皈依佛诵经	(206)
二、仇女寻踪 暗中密访	(212)
三、血溅佛堂 孙居士被刺	(216)
四、孙施两家的法理争讼	(220)
后记	(230)

第一章 初投北洋

(1885—1908)

一、飘零少年

1885年4月17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山东省泰安县下乔庄一个破落贫寒的人家里,一个男婴啼哭着来到人间。40余年后,这个出生于动荡岁月的男孩,自封为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他就是本书传主——孙传芳。

众所周知,被誉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主峰就坐落在泰安境内。我们不想简单套用“地杰人灵”的成语,仅想指出,孙传芳的故乡泰安确是一个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地方。历代文人赞美泰山的诗文数不胜数。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饱览泰山之巅的风光后,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如今,泰山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级名胜,山上的风光和古迹无须我们一一赘述,但人们往往对泰山脚下泰安县境内的名胜古迹并不清楚。

泰安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著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就在泰安县境内。位于泰安县城东北的汉明堂遗址和县城内的岱庙都可以作为该地区古代文化兴盛的见证。泰安的物产在华北地区也可算得上丰饶,花生与棉花产量曾居全省之冠。

孙传芳的故乡下乔庄,在泰安县城以东,距泰山约四十华里。

孙家虽非当地名门望族，但也世居有年。^[1]

据孙传芳后人所提供的有关下乔庄孙姓的情况，至晚孙传芳祖父一代已移居下乔庄。孙传芳的祖父名振崧，务农为生。振崧仅生一子，即孙传芳之父孙育典。育典青年时代也曾勤奋读书，锐意科举，二十多岁时便考中秀才，但后来屡试不第，只好以教私塾为生。在乡村当个私塾先生收入自然并不丰厚，维持生计而已。尽管收入微薄，孙育典授课却十分认真。一些不肯规规矩矩地听讲的顽皮孩子经常要受其呵斥，以至罚站或打手板。不想在孙传芳六七岁时，其父即因此引出了一场祸事。在孙育典任教的私塾里，有一孙姓本家（孙维）的大舅的孩子就读。孙育典打了这个孩子后，那个本家大舅不依不饶，与孙育典扭打起来。在扭打中，育典的发辫被揪下来一大缕。发辫被揪，对私塾先生来说，当然太伤脸面了。育典自认为受了奇耻大辱，无法再见人了，怀愤成疾。不久因伤寒而亡。

孙传芳的母亲张莲芳出身于历城（今济南）一带黄河河工的家庭，张父原为黄河上的一个小头目。孙育典与张莲芳生有三女一男，男即孙传芳，排行最小。

孙育典去世时，其长女、次女已出嫁，家中还有三口人。孙育典生前仅为一穷塾师，没留下什么家产，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孙育典死后，张莲芳只好暂时依傍孙育典的堂兄弟们过活，但不久便因忍受不了孙传芳的堂婶的欺凌，携孙传芳及幼女投奔长女处栖身。

孙传芳的大姐嫁给商河程姓人家、二姐嫁给历城逯姓人家。当时他的大姐家既有钱铺又开烧锅，家境颇为宽裕。孙氏母子三人，在此寄食不成问题。但是至孙传芳十三四岁时，孙氏母子尚属安定的寄食生活又因义和团在山东兴起而被打乱。

19世纪末年，原为民间反清秘密组织的义和拳逐渐转变为以反洋教为主要宗旨的群众团体。原山东巡抚毓贤既有盲目排外思

想，又无兵力剿办义和拳，便改义和拳为团练，称义和团。遂使山东义和团席卷全省。这一形势对已侵入山东各地数年的西方教会势力造成很大威胁。驻北京的西方公使屡次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西方使团和荣禄等都看好袁世凯，于是1899年底清廷便改任袁署理山东巡抚。由于当时西太后对义和团态度暧昧，袁世凯开始尚不敢对义和团大动干戈。1900年6月，西太后对外宣战后，袁世凯采取极其狡猾的手段，驱使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对于那些不肯受骗而仍留山东境内的团民，袁即以“黑团”或“假团”等罪名，严酷剿杀。商河为山东义和团活跃的县份之一，时有袁军与义和团角逐，孙母遂携子女迁省城济南暂居。

孙氏在济南城内并无近亲可以投靠，只好自己抛头露面，自谋生计。她在街上摆了一个茶水摊糊口，后为招揽顾客，她又让在家乡练过几年武术的小女儿在茶摊旁边耍上几手拳，以吸引茶客。茶客或过路客人围观后，乞钱的任务自然就是孙传芳和他三姐两人的事了。一次孙传芳在茶摊玩耍时，竟不小心把茶壶打碎。孙母见了，又疼又急，劈头盖脸地便把孙家的独苗、唯一的儿子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由此事便可想见孙母当时带一双儿女过活是多么不容易。

孙母在摆茶摊之余，还须找些缝补的活计做，不然就不敷糊口之用。一次孙母替武卫右军营务处的兵士们洗衣时，偶然得知营务处有一位秀才出身的军官因夫人患疯癫症久治不愈，倍感苦恼，正拟寻觅一健康姑娘为继室，以解房中空虚并接续宗桃香烟。这个秀才出身的军官就是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武卫右军营务处执法营官王英楷。王也是山东人。孙母欲将三女儿嫁之，托人说合。相见后，王见孙传芳的三姐伶俐健康，欣然同意。

孙传芳的三姐续弦给王英楷后，孙氏母子的生活也有了着落。王英楷此时已任武卫右军高级军营，饷银丰厚，衣食不愁，供养两个亲戚自不成问题。从此孙传芳也有机会就读私塾。此时，孙

传芳已 15 岁，既然读私塾，就须向先生报姓名及籍贯。为了向外人掩饰孙父的落魄及家世的萧条，孙母将自己的儿子更名孙传芳，并将籍贯改为山东历城县。^[2]

孙传芳的三姐得嫁王英楷，不仅使孙氏母子衣食不愁，而且为日后孙传芳投军发迹打开了门路，王英楷可称是孙传芳人生道路上对其有知遇之恩的第一人。

二、投军逢时 东渡深造

孙传芳母子随王英楷夫妇移居保定，更使孙传芳得交好运，不仅一帆风顺地进入北洋武备学堂修习，而且入伍后又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

王英楷随军移驻保定，是由于 1901 年底，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事实上自 1870 年以后常驻天津。因自该年起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清廷当时规定，不封海期间，直隶总督驻天津；封海期间，返原驻地保定。但此时天津还被八国联军占领着，袁世凯只好暂时驻扎保定。

袁世凯自甲午战争以后，即官运亨通。甲午战争中，由李鸿章把持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淮军各部和刘坤一统领的湘军也一败涂地。清军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一时朝野上下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响成一片。1894 年 11 月，清廷成立了以恭亲王为首的旨在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的“督办军务处”。善于钻营的袁世凯千方百计谋得定武军改编扩建为新建陆军的差事。

定武军驻地为天津东南的小站，原为淮军盛字营（即周盛传所部）驻地。盛营在此驻扎 20 余年，甲午战争中全军开赴前敌，因继任统帅卫汝贵临阵脱逃问斩，全军溃散。1894 年底，清政府委派长芦盐运使胡燏芬在小站组建新式陆军，号定武军。在袁世

凯到小站后，一面改编，一面又按已获准的扩编计划派人添募两千余人，很快建成一支总数为7300人的新建陆军。

自曾国藩办湘军起家，“练兵”就成为汉族大官僚巩固和扩大权势的要诀。而袁世凯统率的新军，在19世纪最后三年两次得机扩编。第一次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当袁还未得到督办新军美差之时，曾插足维新运动。得到督办新军的差事后，他开始仍脚踏两只船。到顽固派要与维新派摊牌时，他见光绪帝一派势弱，又出卖了维新派。袁的这一手赢得西太后等的青睐，因而当袁提出编练由荣禄统一领导的武卫军的建议时，便被清廷采纳了。1899年初，荣禄设立北洋军务公所，将分驻京畿内外的毅军（宋庆部）、新建陆军（袁部）、武毅军（聂士成部）和甘军（董福祥部）编为武卫左、右、前、后四军，又自募一军，称武卫中军。在这次改编中，袁世凯乘机增募2000多人，使武卫右军兵力达到1万。袁军第二次扩编在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之后。袁到鲁后，即将该省原有的30个勇营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总数超过万人。加上已编练好的武卫右军，袁总兵力超过2万，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武装。正因为袁世凯势力膨胀，羽翼丰满，1901年11月原直隶总督李鸿章病逝前，曾口授遗疏上奏“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3]当时尚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也以袁到山东以后，积极向八国联军进犯后西逃的清室解送银两，而对袁信任有加，于是在李鸿章病故当日，使下令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一职。众所周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仅据有控制京畿的兵权，而且掌有北方口岸对外交涉和通商事务等职权，是晚清实权最重的地方要职。袁世凯出任该职以后，权势更加急剧膨胀。一个以袁为首的北洋官僚集团便形成了。

北洋集团最大的政治资本当然莫过于北洋新式陆军。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后，立即派王英楷等心腹招募壮丁6000余人，编成10营“新练军”。1902年6月，袁在保定稍事整顿后，便设立北

洋军政司（1904年改称北洋督练公所）作为直隶编练新式陆军的指挥中枢，自兼督办。次年5至6月间，军政司在保定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这是全国最早成镇的新军，规模相当于民国时期的陆军师。该年底至次年春，袁又以保阳练军马队及驻马厂的北洋亲军为基础，添募人马，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北洋常备军相继成镇后，急需大批懂得新军教练的中下级军官。于是，北洋军政司很快于该司教练处名义下设立“练官营”。顾名思义，“练官营”就是培养训练中下级军官的营地。“练官营”设在保定，总办冯国璋，帮办张士铭，下设步、马、炮、工四队。“练官营”的成立，给当时正寄养在王英楷家中的孙传芳提供了一个谋求个人发展的好机会。

1902年夏，北洋“练官营”在保定城关外设立时，孙传芳已近18岁，是个大小伙子了。如前所述，自传芳三姐嫁给王英楷作二房以后，孙氏母子的生活有了着落，吃饭穿衣不用发愁了。但孙传芳的出路仍是一个大问题。他童年丧父后，为生活所迫，随母飘流山东各地，没能得到读书的机会。15岁以后，他虽在王家读上了私塾，但要走科举仕进的道路，似已嫌晚。孙传芳是颇具自尊而且要强的人。尽管姐姐姐夫待他尚好，他却很想尽早脱离依人寄养的境地。而王英楷以一个秀才，弃文从武仕途通达对其选择出路自然也有榜样的作用。1902年8月，“练官营”招生时，孙传芳便向王英楷提出了投军习武的要求。王也早就在考虑这个小内弟的出路，见他提出的要求符合自己的心意，而且又容易办到，便很痛快地应允了。

有身为军政司要员的王英楷的保荐，孙传芳顺利进入“练官营”，被编在步兵科第三班。孙的天份好，聪明，又知努力，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因此各科成绩，无论是学科、术科还是操法，都相当不错。1902年底（光绪二十八年）孙传芳在练官营结业后，又得到练官营总办冯国璋荐举，保送至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深造。同

时被保送的还有孙的朋友，后来也成为王占元心腹的杨文恺。^[4]

在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开办前，袁世凯已责成军政司在保定为北洋常备军设立了一批具有短训性质的简易军校，如将弁学堂、武师范学堂、参谋学堂和测绘学堂等。日后成为直系军阀首领的吴佩孚此时尚为测绘学堂的学生。1903 年秋，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扩办。上述具有短训性质的军校先后并入北洋速成学堂。

北洋速成学堂已是一所比较正规的近代军校，开办后学制定为二年。该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为段祺瑞；总办先为郑汝成，后为赵理泰，首届招生 200 人，分为步、马、炮、经理、测绘等科。其专业和课程设置，基本仿照德国常备军制度。1906 年 8 月，清政府将该学堂的管理权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中收走，改归中央练兵处统管，并定名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不过人们习惯上仍称其北洋武备学堂。

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大都充任北洋六镇的中下级军官。该校学生后来跻身于北洋军阀行列者多不胜数，其著名者除孙传芳外还有靳云鹏、齐燮元、王承斌、吴新田、熊炳奇、李廷玉、师景云、张联棻等等。^[5]

对自幼生活贫寒、随母四处飘零的孙传芳来说，能够进入北洋武备学堂深造，当然是个人生活道路上莫大的幸运。按照北洋军勋章，北洋武备生皆可享受全饷待遇。享受低级军官的全饷，过奢侈生活当然不敷，但奉养一个持家勤俭的老母亲却足够了。因此，孙传芳入北洋武备学堂后，在经济上已可不再依赖王英楷而自立门户了。

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历经贫寒困顿的孙传芳学习非常努力。1904 年，孙传芳以较优的成绩按期完成了北洋武备学堂的各科军事课程和操法课，进入实习阶段。此时，袁世凯一手操办的北洋六镇已先后编练就绪，孙传芳拿到军校方面的结业成绩和考语后，被指派到由其三姐夫王英楷任统制官的北洋第二镇第二

协实习。到第二协后，孙传芳遂被任命为候补副军校。在北洋军中实习期间，孙传芳亲身体验到“军制日新”，如能有机会到西洋或东洋深造，对日后发展更为有利。而此时，北洋新军中赴日深造的青年军官与日俱增，隐然成为风气。^[6]当年（1904年），孙传芳便在王英楷的支持下，参加了由练兵处举行的考选赴日留学生和游学生的考试，与孙传芳同届毕业的北洋武备生40多人与孙一同参加了此次考试。笔试成绩，孙名列前茅，后又经练兵处面试合格。此次通过练兵处考试，并得清政府批准公派赴日本军校深造的游学生除孙外还有卢香亭、杨文恺、周荫人、吴兴新、卢金山、贾德耀、张树元、张国威、赵恒惕、王金钰、徐树铮、姜登选、陈文远、曲同丰、付良佐、阎锡山、刘存厚、李根源、尹昌衡等。这些人中除了来自南方的李根源、尹昌衡等少数几人外；后来大都先后成为北洋军阀中的高级将领。

1904年8月，这批赴日本军校学习的学生在留学监督赵泰率领下，由天津转上海乘日船“大智丸”号出国。

按照当时清政府与日本方面的协定，赴日学习军事的中国游学生一般要分三段方能完成学业。第一段，先到振武学校学习，这是预科；第二段，入日本陆军步兵联队实习，充当候补生，接受下等兵至下士的训练；第三段，正式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孙传芳自1904年9月抵日后，先到位于东京的振武学校学习了不到两年。在这期间，孙不仅进一步学到近代军事理论，而且初步掌握了日语。1906年从振武学校结业后，他被派至日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当候补生。次年11月学习期满。随后，即以下士资格进入日本陆军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习步兵科。

20世纪初叶的日本，正处于军国主义发展时期，“凡社会所表现、报纸所记载随处皆含有军事意味，纯然军国主义之国也”。一个正走向军国主义的国家的军事学校的教育，必然是法西斯式的。日本军校训练，特别强调“武士道”精神，其野蛮性可以想见，正

如一些亲身经历者所描写，“其练冻也，而一营全数僵卧于野者有之；其练热也，而成灼疮者有之；其练跑也，至大多数倒于地者有之；其练饥也，至一昼夜之操练而不假食者有之”。^[7]任何近代国家的军事教育，都要培养学生的爱国和民族精神。但以野蛮方式培养学生逞凶好斗、残酷，仇恨其他民族，则是法西斯军国主义泛滥的表现。日本近代军事教育特别注重所谓“武士道”精神，正是由其军国主义抬头所造成的。孙传芳在日本接受近代军事教育的同时，自然也受到这种武士道精神和法西斯主义的毒害。他在日期间，不仅遵命参观过“靖国神社”、“菊花人像馆”和“国光馆”等专门宣扬军国主义的场所，而且与狂热的日本法西斯军人多有交往。例如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人都有所接触。特别是冈村宁次当时曾任东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的区队长，和孙传芳相处颇洽。1926年，孙传芳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曾延聘其为联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月支薪俸800元，可谓优礼有加。

孙传芳投北洋军之初，便两次得到深造的机遇，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高级军事人才，为其日后在北洋军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 释：

[1] 以下有关孙传芳家世的资料，多为孙传芳长子孙家振先生提供的口碑。

[2] 按孙氏家谱序列“育、维、永、济”，孙传芳应为维字辈。但如今孙氏后人已不清楚孙传芳当年谱名第三字为何字（孙维？）。

[3] 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杨文恺《孙传芳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81页。

[5] 《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同学录》。

[6]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孙传芳与吴佩孚之间》，台湾《传记文学》。

[7] 《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160页。

第二章 王占元的爱将

(1909—1920)

一、学成归国 重返北洋

孙传芳在日留学期间，正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同盟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积极发展组织，留日士官生参加革命活动者不乏其人。孙传芳在日留学五年，当然不可避免地与某些革命者也有过接触。据孙氏《墓志铭》记载，其在日本也曾“加入同盟会”，并与李根源等关系密切。^[1]但是，迄今我们还未发现其参加革命活动或发表革命言论的其它资料。结合孙传芳归国后的表现，分析其当时政治思想和态度，似可以断定，孙传芳在留日士官生中应属保守派。

1908年12月孙传芳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回到原步兵联队见习三月，于次年3月返国。回国后，孙传芳先返济南与张氏完婚。办完婚后，他方至天津直隶督练公所报到。

孙传芳返国之际，中国政局正因清统治集团出现五十年来最大的变故而动荡不安。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把持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相继病亡。慈禧太后垂危之际，安排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少壮亲贵对北洋系势力的扩张疑忌已久，早在慈禧在世时，他们已从袁世凯手中夺走北洋六镇的兵权。载沣监国后，更想进一步严惩袁，并彻底打垮北洋势力。按载沣本人愿望，是要杀掉袁世凯并重惩

其党羽。但当他以此意征询满汉重臣意见时，遭到多方反对和掣肘。这样，少谋寡断的载沣怕在内政外交上惹出自己不能应付的麻烦，只好将袁驱逐出朝了事。随后，袁的一些重要党羽也被休致或免职。^[2]

然而北洋集团的势力早已根深蒂固，不是少壮亲贵短时间可以清除殆尽的，例如孙传芳等从北洋六镇选拔出来的留日士官生的仕途即未因袁世凯被罢官而受到什么影响。

孙传芳等返国的当年8月，陆军部在北京举行对留日士官生的考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袁世凯的政敌之一、陆军部尚书铁良，但副考官中却有孙传芳的三姐夫、陆军部右侍郎王英楷。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皆第六期毕业生，除孙传芳外，日后成为著名人物的还有尹昌衡、阎锡山、李烈钧、唐继尧、刘存厚、赵恒惕等。^[3]孙传芳经初试后即被授予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他领到的“陆军部执照”是这样写的：

陆军部为

发给执照事：照得游学日本陆军步兵科毕业生孙传芳年25岁，系山东历城人，业经本部奏请

钦派主试大臣考试该生所习学科，术科核定等第，奏明在案，合行发给执照。^[4]

1909年底，孙传芳经陆军部复试后，返回天津督练公所候差，很快被派到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二协第五标充教练员。当时第二镇各级主官依旧是“小站将弁”。镇统为马龙标，第三协协统为王占元，第五标标统为王金镜。王占元与王英楷有同乡之好，孙到第三协后与王即攀上了关系。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成功，二日内占领了武汉三镇。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已被当年春广州起义搅得心惊胆颤的清政府预感大事不好，急忙调兵遣将，往湖北镇压。此时，清政府共计拥有十四镇又十八混成协的新式陆